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1998 年规划项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研究

(研究报告)

项目主持人：丁 素

主要参加者：郑强胜

刘玉军

陈西川

崔登云

一九九九年七月

前 言

农村小康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开展对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试图从对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现状的分析入手，找出困扰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尝试制订相应的对策，包括明确和完善农村小康文化建设思路、建立合理科学的良性建设机制、进一步搞好建设措施等。本文的特点在于面向农民、面向基层、面向小康农村来探讨小康文化建设问题，对于推动整个农村文化建设乃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决策提供一定的实践依据和理论参考。本文的重点在于：①探讨怎样确立和进一步完善农村小康文化建设机制；②探讨怎样有针对性并且行之有效地制订建设农村小康文化的措施；③明确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的导向性。本文的最终目的在于研究怎样为小康农民的精神需求创造良好的文化大环境，使新时代的农民精神更充实，生活更丰富，追求更多样，志向更远大；怎样为树立新时期健康的农民形象提供文化保证，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课题组

一九九九年七月

目 录

一	小康文化、小康文化建设概说	(2)
二	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现状的基本分析	(5)
	(一) 小康文化的创业之路	(5)
	(二) 生动活泼的建设形式	(10)
	(三) 值得吸取的基本经验	(19)
	(四) 不容忽视的突出矛盾和主要矛盾	(26)
三	进一步加强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31)
	(一) 明确与完善建设思路	(31)
	(二) 建立合理科学的良性建设机制	(42)
	(三) 进一步搞好建设措施	(61)
后	记	(9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研究

建设农村小康文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农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全新的变化。逐步摆脱了贫困，走向富裕的多数中国农民，不仅享有着与昔日相比难以想象的现代小康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小到风俗习性、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言语穿戴等，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了与传统生活模式大相迥异的新特征。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必然会酿造出类型各异，形式多样，更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农民精神世界的新的文化样式。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下，尤其是随着党在农村一系列文化政策的积极倡导和有效落实，建设与小康经济相适应的小康文化，开始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应当说，新的时代背景和颇受关注的农村小康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现象。从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上讲，它是农村深化改革，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规模不断扩大，农民精神需求日趋旺盛的必然产物，是反映农民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的变化，体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发达程度的文化折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康文化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制约和影响农村经济未来前景的重要因素，是农村社会全面腾飞的重要智力支持和动力保证。也许正是这种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和作用，才使得人们把小康文化看作是农村小康生活的重要构成，看作是农村小康目标全面实现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还把大力推进和发展小康文化视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文化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积极的战略步骤。所以如此，就在于农村小康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农村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在我国农村，多数已达到温饱并正在迈向或已经进入小康阶段的农民兄弟，迫切希望其精神文化生活也能达到小康，这就必然会涉及到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在这种新形势的要求下，大力建设农村小康文化，探索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有效途径，更好地满足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加速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积极防止和抵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回潮与渗透，有力地促进农村小康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既是一项摆在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广大农村工作者面前的十分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又是一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一、小康文化、小康文化建设概说

“小康”按孔子所言，就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礼记·礼运》卷二十一）在这里，孔子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小康生活的美好画卷。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孔子用较为宽广的眼界走出了单纯用经济条件衡量小康社会的樊篱，把小康的内容拓展到部分精神生活的领域。按现代人的理解和阐释就是看到了小康内容中物质与精神的结合、经济与文化的统一。当然，2000多年前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孔子关于小康的这种“结合、统一”，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固然不能成为当今意义上讲的小康生活的历史根据，但他关于小康应包括经济、文化等多项生活在内的“并有之说”，对当今人们认识理解小康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对社会的认识逐步深入，对小康社会及小康文化的认识也随之透彻起来。

当历史发展的篇章翻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即在1979年的时候，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不久，他在会见日本首相时指出，我国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他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借用了古代“小康”的概念，首次提出了到2000年的“小康奋斗目标”。由此，关于小康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问题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以及党的十三届七中、八中全会和全国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都曾对小康的基本含义和目标作过重要的阐述，而且把建设和实现小康的重点放在了农村。如1991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总目标是：“在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使广大农民的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逐步实现物质比较充实，居住环境改善，健康水平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这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小康，是包含着两个文明一齐抓的小康。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它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又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农民个人健康水平的提高，又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等。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在河北农村考察时指出：“没有农村的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由此可见，实现小康，已成为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实现未来发展的必然阶段和重要问题。而在有着战略地位的农村工作和任务中，建设与农村小康经济相匹配的“农村小康文化”也就当然成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尤其是文化战线和农村基层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都应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形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强调农村生活实现小康，当然也就有个与物质的小康相适应的文化的“小康”问题。这不仅符合目前我国的农村实际与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迎合现代社会多种文化渗透于农村生活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观念、文化行为和生活方式的现实，而且也是农村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趋势，是时代发展的历史产物。在这里，我们所讲的小康文化从全新的意义上说，应当是属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

下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或社会文化现象，与历史上任何一种称之为“小康”的文化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因此，在现阶段，所谓小康文化，主要是指“小康社会”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它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由温饱到富裕这个历史过渡阶段中，农民文化生活比较丰富，精神生活比较充实，自我参与比较广泛的农村新型文化形态或新的文化现象；是由农村社区文化、企业文化、节庆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乡村文化、家庭文化、市场文化的多种成份构成的社会大文化体系；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其形式的，按照多层次、多民俗、多渠道、多样化要求建立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群众文化的动态系统；是体现现代科技、竞争、开放等意识，扬弃传统文化、赶赴现代农业文明的时代精神。

我们所说的农村小康文化建设，广泛地说，就是指我国农村在实现小康目标的过程中，各级党和政府领导、组织、动员当地乡村、企业、学校、机关、社团、家庭、个人等各种力量，以小康经济为基础，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以满足农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和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科技文化素质，培养“四有”新型农民为目标，以建设现代化新农村为根本任务，促进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事业全面发展，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社会大文化系统工程。具体地讲，就是以文化教育、文化活动、文化服务和营造文化氛围为主要表象，以精神面貌、道德责任、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为深层底蕴，以农时季节、重大节庆、经济活动为时空布局，以农民精神需求和各种娱乐为活动内容的农村社会文化现象。概括而言，就是农村建设小康文化的工作。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建设小康文化应当有个具体目标与层级标准。否则，建设工作难以看出具体实效，难以权衡工作开展的基本情况，也难以从数量和质量上体现文化的“小康”。正如上述分析的那样，小康文化既是一种迎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适应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新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又是一个内涵丰富多样，外延不断拓展的大文化体系；既是一个整体性、全局性的范畴，又是一个分层次、分阶段的，其大目标与层级标准随着小康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的动态系统。

我国农村要全面实现小康，县、乡以下的各级组织由于其职能和作用不同，所以，建设小康文化的基本框架与目标体系自然也要有个不同的层级标准。在国家尚未颁布统一的标准之前，我们认为，拟定建设标准的总原则，应当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实现小康总目标的要求，从国民经济、生活质量、人口素质、生活环境、文化娱乐、社会保障、卫生体育及综合社会经济指数等多方面提出基本框架，从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针对农村所作出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建设方针、政策、决定、条例等为设计标准的基本要求，在充分结合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来制定其具体目标、措施和方法。同时，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农村都是以乡村为单位分家按户居住，因此，建设小康文化的重点应放在乡镇，尤其是行政村。这是我们搞好这项工作的基本对象。

二、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现状的基本分析

如何带动已实现小康的农村地区文化奔小康，使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一直是农村、农民、农业迈向现代化的重要课题。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党在农村一系列文化政策的落实，在全国许多小康农村，相继开展了小康文化的创建活动，不仅实现了小康文化从无到有，建设规模由小到大，农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而且也探索出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建设小康文化的好形式、好经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

（一）小康文化的创业之路

农村小康文化的兴起与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它与农村小康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小康乡、村建设，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文化的辐射、影响和带动以及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文化政策的有效落实，各级农村基层组织扎实勤奋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

80 年代中期，在江苏苏州的农村地区，已步入小康的农民开始追求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在需求日盛的热情催动下，一种新的农村文化样式——小康文化悄然萌生，并有了明确的“小康文化”这一提法。尽管当时对处于

朦胧状态的小康文化还没有清晰的、科学的表述，但是其基本含义和主要意喻还是逐步地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其建设的想法和做法也开始影响周边的农村地区，它作为农村文化一种新生事物也开始在一些农村蔓延。这期间，各具特色的民俗民族文化活动恢复了往日风采，各种民间剧团和演出焕发生机，欢快、娱乐、祥和的各种文化活动成了当地农民们追求的一种现代时尚。而与此同时，有着一定经营性质的农民文化专业户也应运而生。尽管当时这种新生的文化样式还十分幼弱，但从它那贴近农村生活、反映农民精神世界而开展的丰富内容中，生动活泼的形式中所散发出的诱人的泥土文化清香，便很快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农民以及当地农村的文化基层组织以极大的兴致和热情关注着它、效仿着它、拥护着它。从此，小康文化开始起步而在农村生根。

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农村小康经济生活的不断普及，在邓小平提出：“要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的思想指导下，在江总书记倡导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的明确要求下，在各级党委、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政策和措施的不断落实下，小康文化开始步入成长阶段。这期间，农村文化活动频率较高，参与人数较多，内容较广，样式较新，规模较大且不断规范。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文化设施较好，文化积淀较深的农村地区，不仅文化活动的水平和质量有所提高，而且人们对文化活动的看法和对文化的消费观念也开始有了由里到外的转变，文化的商业行为增多，小型、小规模的小康乡村文化市场开始出现。而与此相配合，政府行为日渐增多，不仅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以扶持和引导，而且还建立了临时或指定的相应监管机构，并不断培养、壮大和稳定了一支比较有保障的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如河南省焦作市1991年8月以来与建设小康村同步实施的“小康文化建设工程”，从农民自发到政府引导，从上级规划到基层实施，从实践探索到理论深化，使小康文化建设取得了进展。他们根据本市辖区农村的基本情况，依照全市创建小康村的总体规划和小康村十五条标准，并结合当地小康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立足建设乡、村的“小康文化中心”，从

底子比较好的文化站（室）中确定 176 个作为第一批小康文化中心建设村，按照第一批明星村、小城镇建设为样板，进一步推进创建文化先进县（市）活动，加快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步伐。为此，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关于焦作市开展创建文化先进县活动的意见》、《关于加强小城镇社会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文化系统服务农村小康建设的补充意见》等。同时，还根据河南省文化厅《关于开展创建文化建设先进县活动的通知》以及争创“百强文化站”的具体标准，制定了《小康村文化中心（站）达标标准》以及目标责任制的管理办法，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创建活动，涌现出了以温县为代表的“小康文化中心建设工程”，以及全市性的“千村书架工程”、武陟县农民群众自发组织的业余剧团等好典型。截止到 1997 年底，包括建设小康文化内容在内的小康村已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 92.6%，新建文化娱乐场所 196 个，实现了村村有文化室、图书室和各种文化活动场所。其中除了 33 个乡（镇）已建成小康文化中心外，有 200 个基础条件好的行政村相继建起了设备齐全、标准较高的小康文化中心。由于措施得力，工作扎实，焦作市先后有 12 个乡（镇）的文化站进入河南省“百强”文化站。沁阳市、修武县还分别跨入了全国、全省文化建设先进县（市）的行列，使小康文化建设开始走上了有序、规范、健康的成长之路。

90 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小康文化建设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这期间，我国农村文化事业发展遇到了难得的良好外部条件和有利环境，这就是中央对农村文化工作进一步重视。1995 年 11 月，中宣部、农业部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并确定 1996 年下半年举行的六中全会以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为主要议题；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不久，文化部又明确地提出了农村的文化要以建设小康为目标的要求，强调创建文化先进县以及所开展的其他类型的创建活动，必须紧扣小康文化建设目标的具体要求，并把大力推进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看作是“九五”期间我国农村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并进一步强调，把小康文化目标的全面实现看作是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我国农

村全面实现小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认真抓紧、抓好、抓实；1996年初在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文化部再次强调要加大农村文化工作力度，推进农村小康文化建设……这些都为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繁荣注入了强大动力。

根据这些指示精神和明确要求，全国各地农村依据本地实际，掀起了各具特色的建设小康文化的热潮。这期间，文化部的领导同志还多次指出：文化生活是小康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达不到小康标准，小康目标就不能全面实现。为贯彻这一具体的指示精神，一些率先进入小康生活行列的先进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创建出了一些具有本地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地域文化优势的农村小康文化的建设典型。如1996年5月召开的全国文化先进县（市）经验交流会上，河北省把小康文化建设指标系统化、数量化的好经验得到推广；6月份河南省以“小康文化建设”为主题，在焦作市专门召开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并介绍焦作创建“小康文化中心”的经验；也是在这一年，除台湾外，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全面布置、相继开展了以围绕小康文化建设而进行的文化先进县（市）的创建活动，出现了河南许昌、山东文登、深圳南岭、广东小榄、上海马桥等地农民文化大院的先进典型。许多地方以此为契机，还相应地组织了文化先进乡（镇）、村的创建评比活动，而且这些活动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当地政府的直接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这期间，全国涌现出了120个文化先进县，83个中国民间艺术之乡，18个特色艺术之乡和13个蒲公英农村儿童文化园等。

文化先进县乡活动的开展，有力推动了小康文化建设。在全国许多农村地区，甚至在一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农村地区，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建设小康文化得到了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加大了对当地农村文化工作的领导，制定规划、增加投入、落实目标责任，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层文化队伍的培养，强化农村文化阵地，而且还表现在有组织和农民自发相结合的群众性文化创建活动的开展，出现了许多颇有特色、在后来被借鉴推广的诸如“文明村镇”、“三户一村”、“文化大院”、“十星级文明农户”、“万里边疆文化长廊”、“万村书库”、“沿海文化长廊”等群众性的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并创造出了像“农村社区文化”、“村镇文化”、“农村家庭文化”、“节庆文化”、“农村市场文化”等多种农村文化新样式，涌现出了“乡土乐园”（安徽）、“东海明珠”（浙江）、“南粤锦绣”（广东）、“乡村都市”（河南）等农村文化的典型格局。此外，江苏阴冶山村成立的以培养科技、管理和经营人才为主的全国第一所村办“大学”，华西村创办的外语、贸易培训中心，河南南街、竹林、丁烟村的“农民夜校”等更使小康文化增添异彩。

在日趋活跃的农村小康文化建设中，由中宣部、文化部、农业部、卫生部等8个部委联合倡导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发挥的巨大作用又为小康文化建设发展增添了活力，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其建设活动向广度和纵深发展。据有关方面对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996年，各地组织戏剧下乡11万多场，电影放映30多万场，向农民赠书报刊1200余万册（份），建立农村书库1.4万个。如安徽的百家剧团、百家喇叭、百支放映队等为农民演出1万多场，观众达400多万人次；广东省各级各类文艺团体为农民送戏1.3万多场，送图书100余万册，建图书室242个；内蒙古伊克昭盟组织10个文艺团体，仅10个月就为牧民送戏上门1200多场……文化部直属的艺术院团以及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心连心”艺术团也加入了文化下乡的行列，在贫困山区、在革命老区、在藏北高原……为农牧民们送去了党的问候、政府的关怀，每场演出都收到了当地、甚至是几百里赶来求乐的数万名观众的热烈欢迎。另外，河南、河北、山西、四川等省还组织科技、医疗小分队，奔赴贫困农村为农民送医送药送科技，送去了健康，送去了致富门路，带动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文化下乡”成了农民求知、求乐、求致富、求文化的援助队。

小康文化的不断发展，也使得农村文化建设水平和农民的文化素质跃上了一个台阶。在大力倡导精神文化、讲求知识的社会大氛围下，农民求娱、求乐、求奇、求新、求文化、求科技的热情不断高涨，催涌出众多发展农村文化的新生点，给小康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各地农村因地制宜，

新生文化幼苗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呈现出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竞相投资和联合开发的多层次、多渠道、多体制的旺盛局面。不仅娱乐种类和方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更富有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改变了过去“文化文化，吹吹打打”的单调老套，并在城市文化的辐射和带动下变得花样不断翻新，品位不断提高，形成了与城市文化交相辉映的全新文化景观，而且文化发展规模扩大，文化的基础加厚，大设施小设备不断增多，为小康文化的顺利、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

与此相应，良好的文化设施和生动活泼的建设格局又进一步催生和助长了农民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农民的积极参与更趋普遍化，对文化的趋赴和追随比以往更强烈，往日多数农村地区习惯的三日一墟，五日一集，变成了当今的既是农贸交易日，又是文化活动日的诱人场景。文化的风雅不仅遍及村街的板报上、农家小院的门头上和屋舍的墙壁上，成为众多百姓追求的一种时尚，而且文化的内容也成了寻常人家互通信息、丰富知识、增长见闻、消遣娱乐的载体，它反映了农民文化水平达到的高度。在近年来文化部评出的“群英奖”中，有相当一批由农民群众业余创作、表演的歌舞等文化节目受到广泛好评。据介绍，参加评奖演出的有一半以上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农村乡镇企业的半农化职工。在参与比赛的许多农民选手中，更多的是抱着参与文化活动的愿望和追求新生活的精神境界，丰富自身内涵，提高素质，表达情感，而已不是过去那种为拿奖而找份工作或是补济一下生活所需的谋生行为。

（二）生动活泼的建设形式

如何搞好小康文化建设，农民群众的探索和实践是最好的说明。在全国各地农村相继开展起来的小康文化活动中，多数农村把当地两个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把党和政府对农村文化工作的要求同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愿望统一起来，把几千年形成的优良纯朴民风 and 现代文明、和改变农村社会风气、提高农民精神境界、建立农村新型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涌现出了许多值得珍视的内容丰富各异、地域特色浓厚、建设形式活泼、实践效果良好、深受农

民欢迎的现实优秀素材。根据目前各地小康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以本地农村的小康乡、村、户为依托，发挥自身能力和优势，广泛开展诸如农村社区文化、村镇文化、庭院文化等农村社区服务活动，实现以文“育”人的小康文化的创建形式。

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来说，在长期的封闭和传统认知习惯下酿就的保守且稳固的文化心态，是面向新事物、接受新文化的一大障碍。在这种文化心态下，要创建一种符合农民需要和现代意识的全新文化，用现代意义上的行为方式去开启和诱发农民内心的文化饥渴，恐怕最根本、最有效、最现实的办法莫过于从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业已形成的良好基础中去挖掘农民的文化潜意识，从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中去倡导创建新文化的意义和热情。以这种方式去审视农村文化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带有共性的结论，这就是在一些经济率先起步，社会条件较好的乡村，文化建设大多是从能人带头，育化农民入手，从农村社会的认知环境中去寻找建设的具体形式。如江苏江阴的华西村、北京房山的窦店村、山东牟平的西关村、陕西渭南的五里铺村、深圳龙岗的南岭村、河南新乡的刘庄村、临颖南街村、巩义的竹林、丁烟村等，他们都是以集体经济的壮大为基础，以众多的小康农户为依托，以农村的能人为骨干，用新的形式以强化农民的思想道德教化为先导，以提高农民素质、改造农村社会环境为根本，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创建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适合当地农民口味和生活习性的文化活动新形式。这些村镇其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一个集体经济基础好，文化建设载体选得好，特别是有一个思想境界比较高，深受村民爱戴和拥护的领头人。（如吴仁宝、史来贺、刘志华、王洪彬、仇振亮、李德海、雷仁义、赵明恩、胡广周等）他们清正廉洁，大公无私，有一种以全村（镇）百姓共同富裕为己任的高尚情怀，有一种使全体农民“脱胎换骨”的雄心壮志，有一种对新事物、新文化不懈追求的顽强信念，有一套因地制宜、贴近农民精神世界的教化措施和手段，使本地乡（镇）、村的两个文明建设搞的红红火火。河南临

颍县的南街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们在“好班长”王洪彬的带领下，经过十多年的创业，以集体积累 30 亿元的资本为本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了坚实根基。南街人提出的目标是建设“红色共产主义小区”，实施的手段是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养德育人，注重文化活动的政治内涵，讲求农村社区的建设形式。正是在这种崇高理想、远大目标和教化方式的催动下，凝聚了全村 3000 余口老少男女不懈奋斗的颗颗雄心。他们没有把发展经济看作是惟一目标，最终目标，而是把发展经济看作是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在崇高的理想下得到了有机结合。南街村的党员、干部追求的是“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即实干、吃苦、奋斗、学雷锋），这种精神鼓舞了村民的艰苦斗志，培养出了独特的农村社区形象。南街村的群众讲求的是现代科技文化的自觉武装：思想锤炼，村里有自己的农民夜校和道德小组；技能培训，村里有自己的科技培训中心、研究中心；消闲娱乐，村里有自己的图书室、学习室、歌舞厅、军乐队、艺术团；锻炼意志，村里有自己的民兵营；文化教育，村里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中专，甚至自办的大学。从刚出生的婴儿到大学生，都实现了一条龙的自我培养，村民的孩子们不出村，就可享受到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所有费用全由村里垫支的教育服务。学校环境优美，设施完备，功能齐全配套，保障有力；体育活动，村里有自己的农民文化宫、电影院、灯光球场；医疗保健，南街村有网络配套的医疗设施和医疗队伍，基本能做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小病不出村，大病能报销。在这里，没有刑事案件，没有犯罪。90 年代以来南街连续被河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文明村”、“明星村”。乔石同志视察南街后，连声称道：“你们干得好，路子对头”。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将南街誉为“豫南一枝花”。中纪委副书记侯宗宾同志还亲笔为南街题词：“共同富裕路，豫南带头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使南街的声誉已享誉全国，被一些人士认为是“没有腐败堕落，没有精神滑坡的一方净土。”

2. 以“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文化大院”、“十星级文明农户”、

“三户一村”等为载体，立足农户搞建设，实现以文“化”人的小康文化的建设形式。

选准、选好、用好载体，是建设农村小康文化的重要途径。探索新形势下农村文化建设的载体，抓以家庭文化为核心的“细胞工程”，是近年来农村小康文化创建工作的一个典型形式。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各种农村文化活动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效果良好的载体形式。现已在许多农村地区流传、推广、效仿的形式主要有：创建“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五好家庭”、“文化大院”、“星级文明户”、“三户一村”、“新风户”、“双文明户”、“四进家门”等形式以及由中央多家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发起倡导、组织实施的如“万村书库工程”、“手拉手工程”、“希望工程”、“文化三下乡”、“送书、送戏下乡”、“农村少儿蒲公英”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在革命老区、革命圣地、贫困乡村、藏北高原巡回演出的“心连心”艺术团等活动。这些形式和活动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反映时代，贴近群众，适合农村新体制的变化，迎合农民追求新、奇、乐的情趣，能抓住农民心理，能体现农村实际，比较好地解决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问题，因此，很受农民欢迎，很快在农村推广。

在众多颇受农村青睐的形式和活动中，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共同特点，就是立足农户搞活动，依靠农民说建设。把载体的基点建立在优化农村社会细胞——农村家庭和农民个人身上，以抓家庭文化，争创文明农户为重点，以抓农民素质，提高生活品位为突破，创出了许多好形式、好办法、好经验。

始创于河南荥阳县的争创“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按照党的农村政策和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从农民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入手，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归纳为10个方面，每个方面用一颗星来表示，标识文明行为的水平和成果，使人们通过挂在农户门上的张张小牌和颗颗小星，便能知晓这家农户的基本面貌。（这十颗星分别是：第一颗星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集体；第二颗星是重视文教，提高素质；第三颗星是科学生产，劳动致富；